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四八一次会议

2015年7月8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范博希曼先生	(新西兰)
成员:	安哥拉	吉莫里埃卡先生
	乍得	谢里夫先生
	智利	巴罗斯·梅莱特先生
	中国	刘结一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约旦	卡瓦夫人
	立陶宛	雅库博夫人
	马来西亚	易卜拉欣先生
	尼日利亚	拉罗先生
	俄罗斯联邦	丘尔金先生
	西班牙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威尔逊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鲍尔女士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

议程项目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5-21060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我代表安理会欢迎侯赛因先生在日内瓦通过视频会议参加今天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热烈欢迎常务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先生阁下。

常务副秘书长（以英语发言）：联合国的最伟大使命之一是防止灭绝种族。过去的恐怖经历和现在的危险提醒我们这一使命的重要性。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是近代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三天后，死难者家属和社区成员、宗教领袖、政要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将齐聚斯雷布雷尼察悼念受害者。我将以秘书长的名义代表联合国前往参加。

今天，我们在纽约开会悼念所有受害者，与受害者家属和社区一样感到悲伤。我们谦卑地聚集一堂，遗憾地承认，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未能防止此类悲剧发生。但我们开会也是要表明我们的决心，即从1995年7月惨不可言的那几天吸取的教训必须帮助我们更早地察觉危险。我们必须构建一个具备更好条件防止这种罪行和暴行再犯的联合国组织。

联合国已承认对未能保护寻求庇护和救助的斯雷布雷尼察民众负有责任。1999年11月15日秘书长提交大会的关于斯雷布雷尼察沦陷的报告（A/54/549）指出了本组织和广大国际社会所犯的过错。同年，有关1994年卢旺达灭绝种族事件期间联合国行动的独立调查也发现类似的缺陷。此后，我们从多方面努力执行这些报告的建议。防止已成

为必要的责任。已任命了一位预防灭绝种族特别顾问，并通过国际刑事法庭将犯下滔天罪行者绳之以法。2005年，大会认可保护责任，使防止灭绝种族、战争罪、种族清洗和危害人类罪成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一项核心责任。

现在通常赋予维和人员以保护平民的强有力授权。他们往往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保护民众。但是，维和人员继续面临许多曾在斯雷布雷尼察困扰联合国的同样挑战，尤其是会员国之间意见分歧导致行动瘫痪和缺乏政治和物质支持。“人权先行”倡议正在给本组织内部带来结构性变化，目的在于改进我们的努力以及早采取预防行动。预防灭绝种族特别顾问和保护责任特别顾问已经制定了一个分析残暴罪行的框架，这是一个评估风险和制定预防战略的有用工具。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和区域组织有义务加强我们的集体预防努力，本着《联合国宪章》第六章和第八章的精神寻求和平解决办法。

安全理事会可以发挥核心作用。我们现在看到，当安理会分裂时，局势如何可能恶化和失控。叙利亚血流成河，无疑有损安理会和联合国的声誉和地位。今天，伊拉克、南苏丹和其他地区也正在发生残暴罪行。极端组织如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博科圣地”组织以及青年党似乎正在竞相采取残暴行动，目的在于在民众中间传播恐惧和制造分裂。我们必须按照《宪章》和道德标准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地同这种暴行和威胁作斗争。当我们无法用言语表达我们的愤怒时，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践行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和原则。

我们大家都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努力建立一个终于汲取过去可怕教训的世界，一个人民能够和平、有尊严地生活的世界，因为这是他们的权利和愿望。世界寄希望于我们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期待我们维护这项权利，满足这些愿望。这是我们今天的共同责任，也是我们悼念斯雷布雷尼察受害者的最好办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常务副秘书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侯赛因先生发言。

侯赛因先生（以英语发言）：大规模屠杀和战争的声音不是机枪狂射声或随身武器砰砰地射击声。多年前我在斯雷布雷尼察听到的灭绝种族暴行的真实声音，是逾万活着的灭绝种族受害者沉闷、低沉的呻吟，她们是被屠杀的8000名男孩与男子的母亲、姐妹和女儿。当时，我们联合国所有人怎么会愚蠢到未预见他们被屠杀的地步？我们怎么会犯下这么多错误？我们至今没有正确地认识这些错误，甚至没有采取正确的纠正措施以避免重犯这些错误。

一个星期前，海牙全球司法研究所和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组织了一次讨论，第一次汇集了与20年前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别是斯雷布雷尼察发生的事件有关的许多主要官员。我们的任务是利用最近解密的文件以及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相关审判提供的资料，拼凑出从1992年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组成到斯雷布雷尼察沦陷和随后发生大屠杀期间的细节。请允许我简略叙述其中一些关键事件。

1993年初，波黑副总理Hakiija Turajlić乘坐一辆联合国装甲运兵车，在萨拉热窝外的一个检查站被波黑塞族士兵枪杀致死。联合国束手无策地看着这一枪杀事件发生。在这起突如其来的流血事件中，联合国失去了冲突双方的尊重。两个月后，莫里永将军将斯雷布雷尼察置于联合国的保护之下，为联保部队挽回了一些信誉，但同时显示联保部队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不受纽约指导。随后，第836（1993）号决议为联保部队提供了这种指导，并提供了一根大棒，使联保部队具有力量，那就是有权采取必要措施，包括使用武力（如北约空中力量）还击针对六个安全区的轰炸。1994年2月成功地使用了这根大棒，联合国威胁将使用北约空中力量，以迫使塞方停止炮击萨拉热窝。

然而，在1994年4月的戈拉日德危机期间，联保部队放弃了这根大棒，当时秘书长、维持和平行动部、秘书长特别代表及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保部队指挥官休·迈克尔·罗斯爵士将军不太热衷于使用武力威胁，仅选择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这种有限的行动，而且仅用于保护联合国。他们担心让蓝盔部队在冲突中站边是显然矛盾的。然而，在冲突明显地一边倒，一方是侵略者，另一方显然为受害者时，在很多人看来，联合国的做法似乎正是站边——站在侵略者一边。

联合国对使用北约空中力量犹豫不决，这意味着波斯尼亚塞族领导层可以一路畅通。1994年，只要联保部队在六个指定安全区中的一个遭到袭击，并请求北约提供更近距离的支援，进而开展所描述的“针刺式袭击”，波黑塞族领导层就会将联合国人员劫为人质。这导致联合国更加犹豫不决，促使波黑塞族领导层施加更大压力。联合国完全陷入被动反应的局面，在1993年《万斯-欧文计划》失败后尤其如此。

只是在1995年5月24日和25日，这种情况才发生变化。在从萨拉热窝附近的联合国武器收缴站撤出重型武器后，更倾向于使用空中力量的新任联保部队指挥官向双方发出警告，要求它们交回武器。波黑塞族在执行该命令过程中动作缓慢，因而联保部队下令实施空袭，而不是近距离空中支援。第二天，波黑塞族轰炸了图兹拉，导致北约对波黑塞族目标实施第二轮空袭。这又导致约400名联合国维和人员被劫为人质。不久后，美国与联合王国和法国一起决定暂停实施空袭。斯雷布雷尼察悲剧的种子由此埋下。

此前，即3月8日，拉多万·卡拉季奇批准了他的“第七号令”，下令波黑塞族军队挤压包括斯雷布雷尼察在内的东部飞地，以便“制造难以忍受的局面……让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居民无望生存或生活”。在6月初形成暂停空袭局面的同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机会，拉特科·姆拉迪奇迅速伸手抓住了它。

6月3日，波黑塞族人袭击了位于斯雷布雷尼察安全区边缘的Echo观察哨所，几乎没有遭遇抵抗就夺取了该哨所。这是对即将发生事件的试金石。第二天，6月4日，拉特科·姆拉迪奇会见了联合国总司令贝尔纳·让维耶中将，得到的印象是只要波黑塞族不威胁联合国工作人员，联合国就不会动用北约空中力量。

一个月后，在波黑塞族军队从东南部向斯雷布雷尼察推进之际，荷兰营分别于7月6日和8日两次请求近距离空中支援。尽管塞族已明显违反了第836(1993)号决议，但两次请求均遭拒绝。当姆拉迪奇看到抵抗很弱时，他于7月8日决定夺取该城。7月10日，荷兰建立了一个阻击阵地。联合国警告说，如该阵地失守，北约将会作出反应。但是，当让维耶中将7月10日晚与托利米尔将军通电，要求波黑塞族士兵立即停止开火时，让维耶在电报措辞中表明了他不太愿意动用空中力量的想法。

7月11日，北约飞机从清晨6点起就飞越斯雷布雷尼察，准备实施轰炸，但让维耶中将没有提出请求。只是在波黑塞族于上午11时开始对联合国阻击阵地实际实施攻占之后，让维耶才向秘书长特别代表明石康提出请求，而后者批准了该请求。但是该命令附带一项条件，即只能针对向联合国阻击阵地实际开火的武器系统动用空中力量，因此这不仅为时已晚，而且力度也太弱。安全区失守。

7月11日夜晚，拉特科·姆拉迪奇开始将这一军事胜利变为欧洲1945年以来规模最大的犯罪行为。显然，就是在当晚，他决定处决聚集在波托查里的1000名男童和男子。屠城始于7月13日。刽子手知道联合国没有发现他们，就继续杀戮，直至8000多名丧失战斗力的男童和男子被杀害。

在从那时起的多年间，虽然这些事件萦绕在我们很多人的心头，但联合国从未对它们进行过一次适当的讨论，只有大会于1999年举行了一次敷衍了事的辩论。非常明显的是，联保部队一开始就没有一项妥当的授权；联合国和北约这两种文化在协作

过程中显然也存在某种程度的混乱。不过，这些男童和男子很有可能活下来，假如在萨拉热窝的联保部队参谋长批准了近距离空中支援请求的话；或是联合国根据6月3日——也即在Echo观察哨遇袭事件发生时——通过的第836(1993)号决议，抑或是在7月6日，即开始向斯雷布雷尼察推进时，或在7月8日，又或是在让维耶中将批准这些请求的7月10日，或在7月11日清晨实施空袭的话。

这给联合国留下的更深刻教训如今与20年前一样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当时未能预见到那时非常明确的事态，今天也仍然没有这一能力，我们总是搞不明白我们在和什么人打交道，在处理什么问题。即便战争初期在克柳奇、科托尔城、普里耶多尔和桑斯基莫斯特发生了很多事件之后，我们当中也都没有任何人认为姆拉迪奇会如此猖狂，在联合国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拥有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实施灭绝种族行为。

我们搞错了——大错特错——但斯雷布雷尼察人民很清楚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人，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我们就是没有停下来足够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对于国际社会处理2013年7月朱巴政治危机的做法，考虑到后来南苏丹发生的情况，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联保部队最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我们几乎是没头没脑地从一场危机奔赴另一场危机，而联合国今天对于其议程上的很多冲突的处理似乎仍然停留在表面。

此外，联保部队害怕波黑塞族。我们联保部队甚至都不允许他们也可能害怕我们或是学会害怕我们。我们常常比较胆怯，而且随随便便地就给人留下这种印象。斯雷布雷尼察的最根本教训就是：要想成功，联合国就必须获得尊重。联合国要想有效开展强有力的维和行动，冲突各方特别是侵略方就必须接受安理会的措施和决定以及联合国的实地存在。他们必须认识到将会产生严重后果，不会出现有罪不罚现象。

我们还常常将事情做过了头，把需要理解压迫者的怨气变成了对他们几乎表示同情。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样做非常危险。更令人震惊的是，我们认为政治局势比较复杂，所以就误认为政治上复杂的事情在道义上也必定是复杂的。并非如此。各方都犯有罪行，这的确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各方罪责程度一样——如考虑到规模和程度，并不一样。就波黑而言，任何人只要想看到道义责任，事实上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于1995年制止波黑战争的鲁伯特·史密斯将军是最具影响力的联合国指挥官。他今天令人信服地表示，联合国行动指挥官必须进行指挥，而其他人员必须开展谈判。若非如此，当指挥官或秘书长特别代表面临其授权或人员或是平民遭受攻击的时候，他们在谈判中就没有什么筹码，而只能让特派团本身遭受损失。

再说一次，只要联合国得不到尊重，就有人会实施更多屠杀。至少，联合国要想兑现其保护平民的承诺，就必须坚决、团结一致和明确地表明其意图。要是2009年在斯里兰卡问题——或目前在苏丹、叙利亚、中非共和国乃至布隆迪和缅甸问题——这样做的话，就会给数百万人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

我还认为，根据1999年的斯雷布雷尼察报告，安全区的概念显然是可行的，但是只有执行得当才行。我认为，应该彻底审查它是否可能适用于当今的一些危机，在这些危机中，无辜民众的揪心痛苦让我们回想起数以千计的家庭为他们永远无法再见的斯雷布雷尼察男人和男孩悲痛哭泣的场景。

斯雷布雷尼察对于1995年7月11日聚居在那里的居民和难民来说是一场灾难，也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和联合国的灾难。它是一个我们抱着万分悔恨仍可从中学习的创伤。对于我们中间许多曾在前南斯拉夫境内为联合国工作的人来说，斯雷布雷尼察将是我们今后许多年每日的心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侯赛因先生的通报。

安理会成员面前摆着文件S/2015/508，其中载有约旦、立陶宛、马来西亚、新西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案文。

我现在请那些希望在表决前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今天，我们在此汇聚一堂，纪念二十年前在斯雷布雷尼察及其周边发生的可怕罪行的所有受害者。

主席先生，在继续发言之前，我愿请你要求默哀一分钟以悼念这些受害者。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注意到俄罗斯联邦代表提出的我们默哀一分钟以悼念斯雷布雷尼察死难者的请求。

安全理事会成员默哀一分钟。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在巴尔干危机期间，该地区发生了包括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及族裔清洗在内的各种暴行。俄罗斯联邦始终倡导调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冲突期间对包括波什尼亚克族人、塞族人以及克罗地亚人在内的各族裔群体所犯的一切罪行。我们有必要自问谁的痛苦最深重吗？审视一下前南斯拉夫境内十年冲突的总体结果，数十万塞族人被驱逐出他们传统的居住地，人们不可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与其他人的痛苦一样深重，如果不是更深重的话。

在该区域和这个世界上，我们的面前摆着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即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实现全面和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倡议纪念《代顿和平协定》二十周年，通过旨在把区域各国人民团结起来的步骤来确保巴尔干能够朝着稳定、安全以及族裔间和平的方向一道迈进。

当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一名代表首次就有必要纪念斯雷布雷尼察悲剧二十周年与我们接触

时，我们同意，鉴于该问题对于居住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整个区域的民众具有特殊敏感性，纪念活动应以一种庄严的方式举行。我们当时说，我们需要做的是强调已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时面向未来。这正是联合王国代表团一开始所说的，它说，它准备编写一份安全理事会决议草案。然而，该倡议的执行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联合王国提交的决议草案（S/2015/508）变得毫无帮助、具有对抗性和政治动机。它含有歪曲，其结果是，过去的责任被基本归咎于一个民族。这种单挑出一方承担战争罪责任的做法是不正当的，可能会导致波斯尼亚社会内部更深刻的分歧。我们从一开始就努力确保该文件是均衡的。我们基于向前看的做法提出了一种备选方案；然而，我们的意见被忽视。

此外，决议草案的作者利用斯雷布雷尼察悲剧性事件的周年纪念来推出某些尚未获得国际一致认可的概念，其中包括有可能导致干涉国家内政的侵入性的人权做法。

英国提出的决议草案立即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内外引起极其痛苦的反响。多个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实体提出截然相反的建议表明，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将不会促进巴尔干的和平，反而将注定给该区域带来紧张，使可持续和平的前景更加遥不可及。这种反应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中的塞族成员、塞族共和国总统以及塞尔维亚总统和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事会成员和秘书长的信中得到证明。我们也收到了类似信函。

该问题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议题，我们甚至可谈论它可能构成真实的威胁，破坏该国通过执行《代顿协定》而如此艰苦得来的稳定。此外，从更宽泛的角度说，我们不能无视对巴尼亚卢卡和贝尔格莱德施加政治压力的企图。

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应该是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础，而非削弱这一基础。每个人

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让历史学家来分析前南斯拉夫境内冲突的来龙去脉，包括仓促决策的各国和联盟所起的作用。让专家来帮助秘书处和国际社会理解我们的弱点在哪里。但是，我们不要让安全理事会沉迷于历史事件，因为在当代世界我们已经面临太多的未决问题。让专家做他们的工作。让他们给我们提供必要的评估。让国家和国际法庭作出裁决。正义必胜。所有肇事者无论其族裔或宗教派别均须受到惩罚。

鉴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本国一如安理会所知，无论是该国议会还是主席团各成员之间一未就该问题达成共识，安理会原封不动地通过该决议草案将完全适得其反，并将加剧该地区的紧张。

7月11日将在斯雷布雷尼察举行一次大型纪念活动。必须指出的是，塞尔维亚领导人将参加那次活动。我们安全理事会采纳一项具有破坏性的文件或者表明安理会成员之间存在分歧从而对此进行预判将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吁请决议草案的作者和主席先生你本人不要把该决议草案付诸表决。否则，我们将被迫出于我在此阐明的原因而对其投否决票。

假如表决变得不可避免，我们的否决票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斯雷布雷尼察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其它地方悲剧受害者亲属的痛苦无动于衷。我们自己也经历过大量苦难。

今后，我们将继续尽最大努力始终如一地执行《代顿和平协定》，并通过促进和解、确保建立真正的集体安全体系以及倡导信任与合作的氛围，有效推动巴尔干地区局势进一步正常化。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大家都需要为之努力的目标。

我再次提议不要把我们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刘结一先生（中国）：主席先生，关于纪念斯雷布雷尼察事件决议草案，目前安理会成员仍存在严重关切，强行推动表决尚存重大分歧的决议草案与推动波黑国内和地区国家和解的精神不符，也

影响安理会成员的团结。中方认为，安理会成员完全可以继续就决议草案交换意见，不应匆忙采取行动。

威尔逊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们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S/2015/508）是一项平衡的案文。我们作出了十分艰苦的努力，以确保案文是平衡的，并且以尊重和敏感的态度来纪念这段历史。请允许我明确一点，双方都有受害者。案文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双方对对方都犯下了罪行。案文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这项决议草案并不是控诉塞族人民。相反，草案支持和解，而承认过去则是和解的前提。草案还呼吁联合国以及我们所有人汲取经验教训，并且根据从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事件中汲取的痛苦教训来行事。

安理会全体成员都知道，我们为就案文达成一致作出了多么艰苦的努力。我们为此一个多月来都在努力。我们把表决从昨天推迟到今天，为的就是使这项决议草案有获得通过的最大机会。我们感谢所有成员的支持和耐心。

安理会成员也知道，我们之间分歧的核心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等同于灭绝种族。这不是安全理事会想要作出的裁定，而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法院在其判决中明确给出的裁定。现在用其它名字来指称这一事件将阻碍，而不是帮助和解。正因为如此，该地区有许多声音呼吁我们着手进行表决，由此来纪念受害者。因此，我认为，现在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应进行表决。

主席（以英语发言）：这项决议草案的主要提案国要求我们进行表决。我现在把这项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乍得、智利、法国、约旦、立陶宛、马来西亚、新西兰、西班牙、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

俄罗斯联邦

弃权：

安哥拉、中国、尼日利亚、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有10票赞成，1票反对，4票弃权。由于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未获通过。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鲍尔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埃利亚松常务副秘书长和侯赛因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作了强有力的通报。

1995年7月，当波斯尼亚塞族进犯斯雷布雷尼察时，我是一名派驻萨拉热窝的24岁的记者。在斯雷布雷尼察安全区沦陷几天之后，我到了那里，当时，我的一位同事首先告诉我有关大规模处决的消息。当时我只能说：“不会的！”、“不会的！”即使我已经生活在一个战争地区，并且遭到围困，即使我见到了数不胜数的暴行，但我还是无法相信波斯尼亚塞族部队会处决他们手中的所有穆斯林男人和男孩。一场可怕战争总有暴行发生，但这简直是惨绝人寰。这是灭绝种族行为，几个国际法庭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这一点。

当我得知俄罗斯打算否决关于纪念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事件的安全理事会决议草案S/2015/508时，我承认，我的反应也是：“不会的！”、“不会的！”俄罗斯为何要投票拒绝承认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事件？今天的表决事关重大。表决对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事件受害者的家人来说很重要。俄罗斯的否决对这些家人来说令人心碎，是安理会记录上的又一个污点。

在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事件十周年和十五周年时，我都在当地，在斯雷布雷尼察。2005年，我见到了我过去的同事大卫·罗德，他是一名记者，今天也到场与会。1995年8月，在大屠杀发生几天之后，在Nova Kasaba树林和田野中的一个乱葬坑中，大卫发现有一条腿伸了出来。随后，他又发现了堆在一起的手杖和眼镜。这些手杖是老年人的，他们被处决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是波斯尼亚的穆斯林。那些可是手杖啊！

2005年，戴维和我与惨死的波斯尼亚受害者的家人一道，走了斯雷布雷尼察许多男人和男孩在逃离沦陷“安全区”时走过的路。当时，这些家人反过来走了一遍他们至爱亲朋走过的道路。虽然距离种族灭绝事件发生已有十年，但我们沿路都看到受害者的遗骸：衣服、鞋子、遗落身份证的碎片，甚至还有四处散落的从地上冒出来的残骨。

2010年，我代表奥巴马总统率一个美国总统代表团访问斯雷布雷尼察，我又一次重走了那段路的最后一站。许多斯雷布雷尼察死难者的孩子参加了那次行走。他们当中有许多十几岁的女孩和青年妇女，她们的成长过程中没有父亲，也没有兄弟。参加行走的青年男子远远少于女性，这是因为一个令人心寒的事实——许多男孩早已被处决。仍有遗骸被挖出，仍有亲人在痛不欲生。我在斯雷布雷尼察遇到了一位母亲，当时，她正为她五个儿子中的第四个儿子下葬，遗骨是在城市中心一个乱葬坑中找到的。她仍然在寻找第五个儿子的遗骸。俄罗斯今天投票否决的是这位母亲的真实故事和痛苦。

我们为什么应继续回顾受害者的悲惨历程，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为此继续聚集在一起——无论是在联合国这里还是在斯雷布雷尼察——以便纪念这一天，并且重新讲述这些令人心痛的受害者的故事呢？我们回顾过去，这样，我们才能试着从我们的集体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我说“我们”，我指的是全世界，是安全理事会，尤其是包括我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它们当时有力量去阻止一切发生，但却没有那样做。

波斯尼亚人相信他们会受到联合国旗帜和它所代表的原则的保护。他们在一个被实际叫作安全区的地方寻求庇护，然而，当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探测联合国是否愿意保护在其照看下的平民时，维和人员退缩了，波斯尼亚塞族向前逼进。首先，他们切断燃料和其他必需品，然后他们袭击维和人员的哨所，此后他们解除维和人员本身的武装并羞辱他们。北约的空袭许诺从未兑现。

我们纪念斯雷布雷尼察事件也是为了表明我们继续致力于把这些暴行的凶手绳之以法。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事件的凶手杀害了8000多名穆斯林男子和男孩，强奸了无数妇女和女童，部分原因是他们相信自己永远不会受到惩罚。这就是为什么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事件被起诉的主谋和指挥官——最值得注意的是拉特科·姆拉迪奇和拉多万·卡拉季奇——目前正在海牙因其所犯罪行受到审判是非常重要的。这表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并且那些滥权的政权——从对本国人民使用毒气的阿萨德政权到迫使人民在劳改营中劳动致死的北朝鲜政府——有朝一日将必须对其暴行作出交代。

正如我们今天看到，一些政治领导人和团体否认在斯雷布雷尼察发生灭绝种族事件，或是不希望承认这一事实。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米洛拉德·多迪克上月称这一灭绝种族事件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骗局”。我们曾经听到大屠杀否认者这样说，最近甚至听到卢旺达灭绝种族事件否认者这样说。讲这种话的人是在羞辱自己，并且误导他们声称代表的人民并使人民感到难堪。斯雷布雷尼察发生了灭绝种族事件。这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国际法院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拒绝承认灭绝种族事件的发生不仅深深伤害已经受尽折磨的受害者及其家庭，而且也是和解的主要障碍。

想象一下一名有5个儿子在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事件中被杀的母亲被告知，否认灭绝种族事件将会促进和解。这是发疯——这种发疯行为的动机是当初助长斯雷布雷尼察屠杀的同样的对波斯尼亚穆

斯林经历的否定。只要否认真相——无论是在安理会还是在区域中——就不能实现有意义的和解。试想一下，如果这是我们自己——如果这些都是我们的家人。如果我们的经历遭到否认我们是否会进行和解？否认灭绝种族事件不会带来稳定。安理会竭尽全力使俄罗斯赞同这项简单的决议草案，甚至没有点凶手的名，但是俄罗斯有一条红线。决议草案不能提及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事件，它不能提及一个事实。

20年前国际社会没有保护在斯雷布雷尼察避难的人，结果是灭绝种族事件。今天，由于俄罗斯拒绝用正确的言辞——灭绝种族——来描述斯雷布雷尼察事件，安理会再次没有履行其职责。这是对一个确凿事实使用否决权，这一事实有数十万页证人证词、照片证据以及我在走访中见到的那种实物法医证据的文件纪录。正如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事件那样，卢旺达灭绝种族事件是一个既定事实。这里是否有人梦想争辩说，因为一伙灭绝种族事件的否认者说，这可能会破坏和解或稳定，因此我们不应纪念卢旺达灭绝种族事件，或者实际上我们应该否认这一事件？否认大屠杀是否会促进和解，还是我们都同意，承认事实和缅怀过去是向前迈进的主要、关键因素？在座每个人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然而一些国家今天选择在承认灭绝种族事件上保持中立，没有投票支持决议草案。

如果在斯雷布雷尼察被处决的男孩——这些男孩仅仅因为是波斯尼亚穆斯林人而被处决——的母亲今天在座，她们会问，怎么会有人对她们的现实投弃权票；但更糟糕的是，她们会问，任何国家怎么可以利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权完全否定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编写和批准《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就是为了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我们大家都已批准的关于灭绝种族罪的《公约》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防止和惩治斯雷布雷尼察的灭绝种族罪。

掩盖自己历史中无论多么令人不安的黑暗部分，不会实现和解。在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听证会

上，凶手和受害者都作证说，即使在实行处决之前就运来重型机械，以便挖土掩埋受害者。许多受害者被蒙住眼睛和双手被绑，当他们被带到处决地点时，他们不仅听到枪声和哭喊，而且还听到正在挖乱葬坑的推土机轰鸣声，他们最终被埋在这些乱葬坑中。

最后，我谨讲述一个故事。拉米兹·努基奇几乎葬身于这样一个乱葬坑中。1995年7月，当波斯尼亚塞族部队逼近波托卡尼时，他告别妻儿，同父亲、兄弟和数千其他波斯尼亚男子和男孩逃进森林。他最近把他的故事告诉一名记者。当男子和男孩在一座山的山顶短暂停留时，坦克和火炮开火了。他的父亲和兄弟同其他人立即被打死。努基奇本人设法逃走，最终找到一个难民营。

1999年，努基奇返回波托卡尼并回到那座山。他在那里找到血迹斑斑的衣服和鞋子以及三具骷髅，但都不属于他的家人。从那以来，他每天都在斯雷布雷尼察周围的树林中寻找受害者的遗骸。他最初寻找其父亲和兄弟，现已成为寻找所有受害者的遗骸。他说，极少有一天他没有找到一些遗骸，他报告波斯尼亚的失踪人员研究所，后者然后对照幸存者DNA网络测验这些骨头的DNA。鉴定身份对于受害者家属而言是重要的，尤其是那些从未能够核实其亲人遭遇的人，以及那些预期亲人已被杀害但没有任何具体证据的人。遗骸帮助他们获得一种期待已久的了结感。正如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所说的，多亏努基奇，许多遗骨有了名字。

今年，在一个万人坑中终于找到了努基奇父亲的部分遗骸，但不是努基奇本人找到的。努基奇将于周六在斯雷布雷尼察埋葬他的父亲——136名新发现的受害者之一，他将被埋在那里一个共同墓地已经入土的6241名受害者的旁边。数以千计送葬者将同他一道举行仪式，他们每年聚集在一起纪念灭绝种族事件。努基奇说起找到他父亲的部分遗骨，“虽然他的遗骸不完整，但我将埋葬他，并且我将知道他的坟墓在哪儿”。他说，只要他还活着，他打算继续寻找其他受害者的遗骨。

我们也必须继续坚持不懈地寻找斯雷布雷尼察的全部真相。一千多名受害者的遗骸仍未找到。他们继续困扰着我们，直到全部找到他们为止，我们不能罢休。只有挖出这些真相，只有承认这一灭绝种族事件、这一灭绝种族事件的严重性，以及我们外界如何未能阻止它，我们才能够帮助该区域走出其历史上这一黑暗时期——帮助它走向我们大家追求的更大和解——并且履行有关在我们时代防止灭绝种族罪的承诺。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法国对于俄罗斯反对通过决议草案深感遗憾，该草案的目的不仅是悼念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事件的受害者，而且也悼念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冲突期间所有方面的无辜受害者，以此回顾安全理事会对预防这种屠杀的特别责任。这样一个议题理应得到安理会的一致支持。但通过反对这项决议草案，俄罗斯阻止了安全理事会对纪念和缅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灭绝种族事件和冲突的受害者表示任何支持。

俄罗斯以确保尊重一次特别纪念为借口，反对安全理事会同各方一道超越过去的苦难，决心在通往和解的道路上前进。要实现和解，就必须承认20年前在斯雷布雷尼察犯下的灭绝种族罪。包括前南斯拉夫问题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在内的国际法院已将该事件认定为灭绝种族事件。

正义是和解与和平的基石，这一点我们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们从一开始就支持的这项案文，旨在纪念过去，但它也展望未来。它还旨在协助巴尔干各国人民之间的和解进程，帮助他们造就安全与和平的未来。我们对今天未能通过这项决议草案深感遗憾，但我们不会放弃。我们必须继续为实现和解与和平而共同努力。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首先要重申，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明确和强烈谴责20年前在斯雷布雷尼察实施的灭绝种族罪行，正如它谴责任

何危害人类罪行，而不论这种罪行发生在何处，也不论其动机如何。

在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及这种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崩溃七十年后，在犹太民族遭到纳粹大屠杀以及苏联犹太人和其他民族遭到杀害而沦为法西斯主义受害者之后，世界继续目睹灭绝种族行为和战争罪行，例如在卢旺达、斯雷布雷尼察、伊拉克和巴勒斯坦以及在Sabra和Shatila，就发生过这种罪行。所有这些都使为防止此类暴行而建立的国际机制的效力以及我们自己的人类状况受到质疑。

我国对这项决议草案投了弃权票，认为它并不是一项平衡的案文，因为它将所发生事件的全部责任仅归于该冲突的一个当事方，忽略了该局势的复杂性。委内瑞拉认为，我们不能因极端主义分子出于仇恨和不容忍动机开展的行动——这些极端主义分子以狂热民族主义旗帜来掩饰其所作所为——而专门指责一个整体民族挑出来。

同样，上述决议草案含有在联合国以往没有商定而现在仍有争议的内容，例如保护责任概念。这一概念有损国家自己对促进和尊重人权所负的首要责任，并损害《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各项原则，包括尊重主权。我们认为，正义必须建立在真相基础之上。正因为如此，我们欢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所做的工作。该法庭负责审判那些对在组成前南斯拉夫的各领土上发生的冲突背景下实施的暴行负有责任的人。

我们还必须铭记，提出的决议草案没有得到有关区域各国当局和人民的一致支持，而这些国家的当局和人民是负责在国际社会支持下推进建设和平进程和确保区域政治稳定的当事方。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这项决议草案不会推动波斯尼亚族、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等族群之间的和解，而会加剧它们之间的分裂。这些族群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一道生活，它们必须努力建立一个以和平、团结、对话和尊重人权为基础的共同未来。联合国的工作应当旨在增进巴尔干各国

人民之间的谅解。正是出于这一理由，我们注重各方之间的和解。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继续进行在代顿开始的工作，做法是执行《和平总框架协定》，该协定是有关各方之间取得政治共识的结果。

吉莫利卡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安哥拉在今天就联合王国提交的关于斯雷布雷尼察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投了弃权，理由如下。

第一，安哥拉在这一问题上没有采取否认立场。不论我们称之为大规模屠杀、大规模暴行或灭绝种族行为，事实都是，我们承认，1995年7月11日在斯雷布雷尼察发生了极为严重的事件。正如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所确认的那样，这些事件无异于灭绝种族罪。

我们的根本分歧源自一个事实，那就是，这项决议草案的案文应当同样顾及在后来成为独立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的领土上发生的战争期间来自该区域各地的数千名屠杀受害者。

我们曾期望，案文将评估该区域各国和各族群之间和解与合作的程度，并展望和平的未来，因地理和历史而成为邻居，拥有共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各国人民，将愈合创伤，实现和解，共建更美好的未来。

在前南斯拉夫境内所发生事件过去二十年后，这样一项决议草案非但不会为持续进行和仍然脆弱的和解进程作出任何具体贡献，反而可能对巴尔干各国负责任的领导人建立更美好共同未来的努力造成消极影响，而这些努力已经产生重大成果。我们曾期望，这项决议草案的最后案文会体现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必要程度的妥协，以便达成一项所有成员都会认可的共识案文。

我们还希望看到这项决议草案注重积极方面，促进真正和解，以吸取经验教训的方式对待过去，并寻求采取面向未来的办法，帮助该区域面对现在和未来的需求，并鼓励、协助和加速巴尔干的和解与合作进程。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谢里夫先生（乍得）（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就新西兰担任安理会主席向你和你的团队表示祝贺。我祝你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一切顺利。我要感谢扬·埃利亚松常务副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扎伊德·侯赛因亲王的发言。

乍得欢迎组织召开本次会议，纪念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向遇难者表示敬意。我们对幸存者表示声援，并鼓励实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解的努力。

1995年7月，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战争期间，在斯雷布雷尼察三天屠杀了8000多名穆斯林男子和青少年，尽管该地已被联合国宣布为安全区，并有一支蓝盔部队驻扎。我们谨指出，斯雷布雷尼察惨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发生的最严重的大屠杀，已经被多个国际法庭称之为灭绝种族行为。斯雷布雷尼察惨案的遇难者之所以成为屠杀的对象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他们残忍地把男子与妇女和儿童分开，然后将这些男子运到事先选定的地点，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冷酷、有步骤地将其屠杀。

那些大屠杀沉重地压在我们的集体良知之上，并将永远如此。国际社会负有极其沉重的责任，因为它面对暴行保持沉默，拒绝行动。甚至在今天，斯雷布雷尼察安全区民众被遗弃的情况仍然不明。我们必须尽力回顾，以便确定真相，这很重要。因此，我们欢迎荷兰调查该国数营部队在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期间的行为，而且已经公布了几份报告。

在1994年卢旺达图西族人遭受灭绝种族之灾之后不到一年又发生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事件，使人们严重怀疑国际社会可用以应对大屠杀前兆的工具和能力。如果说1994年卢旺达灭绝种族行为未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那么我们必须遗憾地指出，面对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行为的准备活动，国际

社会不幸仍然保持消极的姿态。这是整个国际社会进行反思，汲取历史上最黑暗时刻之一的教训，并重申其防止灭绝种族、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决心的一次机会。因此，国际社会应持续评估其可用工具的有效性，把预防作为其努力的核心，以找到可能导致大规模犯罪的情势。

波斯尼亚的局势仍然微妙，族群间关系高度紧张。该国持久和平与和解有赖于还受害者及其亲属以公道。必须伸张正义，以愈合创伤，让一个已经破碎的社会实现和解。因此，我们欢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并鼓励该庭继续努力完成任务。当然，当事国有责任继续并加紧努力，促进和巩固全国和平与民族和解的势头。

我们通过自身经历了解文化多样性的困境，因此鼓励宽容的精神，接受差异，尊重多样性。和解势必以承认灭绝种族行为受害者的痛苦和苦难为基础。因此，我们鼓励实施旨在增进互信的措施，以期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及区域和平共处。

持续纪念大屠杀和建立纪念馆（如波托卡尼纪念中心），对此进程也很重要。不忘历史惨案的唯一方法是定期举行纪念活动，以期此类惨案永不再现。因此，乍得对刚刚付诸表决的决议草案（S/2015/508）投了赞成票，但因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而未能通过。我们对就如此敏感、涉及打击大规模犯罪的问题使用否决权深表遗憾，该决议草案只不过是指出这次灭绝种族事件的历史背景，并没有指名道姓地指责任何一方。

最后，我们认为，必须汲取卢旺达和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行为的教训，用实质性措施体现保护责任，预防最严重的罪行。国际社会对上述两起灭绝种族事件的反应冷漠。汲取这些教训需要提高责任感、承诺和反应，预防大规模犯罪。只有下定决心，展示共同打击灭绝种族罪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意愿，才能使我们与过去决裂。

人道主义组织也应通过提高认识在预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谨向1995年在斯雷布

雷尼察开展行动的人道主义组织表示他们受之无愧的敬意，感谢他们协助当地居民，谴责强迫流离失所，并呼吁警惕可能发生大屠杀，但不幸没有受到重视。我们希望，此类事件永远不再重演。

卡瓦夫人（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常务副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全面通报。

约旦感到遗憾的是，今天未能通过决议草案S/2015/508。在我们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发生的最严重大屠杀二十周年的时候，作为联合国，我们不能忘记这个血腥的悲剧，以及随后对幸存者犯下的罪行。这场悲剧和手无寸铁的城镇的求救呼吁将继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如果联合国当时采取有效的行动应对斯雷布雷尼察周围的各种危险，这场悲剧本是可以避免的。大家都知道，在大屠杀前夕，镇内既无战斗人员，也没有武器。居民们只是儿童、妇女、老人和非武装男子，他们在联合国维和部队完全知情的情况下被残忍地杀害。大屠杀过后20年，我们必须问自己，联合国可汲取哪些教训，以防止此类悲剧重演，并可为受害者家属做些什么。

通过这场大屠杀，本组织可以学到和借鉴的最重要教训之一是，必须建立灭绝种族行为早期预警系统，以便监测此类事件和强化预防外交努力。因此，我们欢迎设立秘书长预防灭绝种族特别顾问办公室，其工作必须继续，它是整个早期预警系统的组成部分。但是，除非安全理事会共同努力，在国家政府不能保护其面临紧迫威胁的公民时，及时落实必要的决议，否则，特别顾问办公室的努力将是徒劳无益的。此外，联合国会员国必须提供资源来支持预警系统、其各个办公室以及联合国维和特派团，这样这些行动才能适当、体面地完成授权任务。

我们要鼓励尚未签署或批准相关国际文书，特别是《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和《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

1997年附加议定书的所有国家这样去做。我们本应都已签署所有这些文书。

此外，我们必须确保通过国家法律和采取立法行动，来保证法治的力量和民间社会充分参与及介入管理，以便防止通过仇恨和号召袭击社会中特定群体来煽动暴力的行为。煽动仇恨可铺垫通往暴力的道路，从而导致发生诸如安理会今天纪念的大屠杀等应受谴责的行为。

一场大屠杀不会冻结在时间内。其后果依然体现在幸存者身上，2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斯雷布雷尼察幸存者的脸上就看到了这一痕迹。伸张正义要求我们确保主持公道和杜绝有罪不罚现象，这样，受害者的家人才会得到应有的公道，从而成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和解进程的组成部分。

约旦呼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继续开展其工作。我们促请所有伙伴继续支持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确保必要的政治意愿，支持国际社会成功伸张正义的努力。

我们确认，本组织自斯雷布雷尼察屠杀事件发生以来改进了其工作方法，以便防止在冲突地区发生类似的屠杀或灭绝种族事件。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继续大胆、明智地担负起我们的责任，纠正过去的错误和避免其重演，并适当应对当今的挑战，以便确保这样的悲剧和屠杀不会在世界上任何地区重演。

拉罗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我也感谢常务副秘书长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作了通报。斯雷布雷尼察8000多名男人及男孩遭屠杀是一次灭绝种族的暴行，该事件20周年纪念之际，人们应当对其反思。我们需要反思使大屠杀能够发生的诸多层面的疏漏，并且要自我保证这样的暴行不会再度发生。我们还需要反思，自那一不幸事件发生以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解进程取得了进展。我们鼓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把过去抛在脑后，在一个团结、和平的国家内向前迈进。

国家负有保护其民众免遭大规模暴行的首要责任。有鉴于此，每个国家都有义务履行根据《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作出的承诺。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履行其职责，确保世界上永远不会再有灭绝种族恐怖行为。

尼日利亚支持建立保护责任问题全球协调人网络，因为这一职责的一致性、力度和有效性完全取决于实施者。因此，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都有责任保护公民不受大规模暴行之害。

建立预测和防止灭绝种族行为的必要制度，至关重要。预警机制、预防冲突方案、迅速干预待命部队和负责有效惩治的国际法院，应当成为优先事项。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政治意愿在弥合绝境中人民的绝望情绪和处理预警信号之间差距方面至关重要。

尼日利亚认为，制定一项可在发生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时迅速实施的国际应急计划，可以作为应对这些挑战的又一途径。应当加强在防止灭绝种族行为领域与非政府组织的区域合作和伙伴关系。必须坚持开展防止灭绝种族行为和其它暴行的有力行动。

尼日利亚依然坚定致力于杜绝有罪不罚现象。我们认为，有罪不罚现象不论在世界上哪里出现，都应予以坚决回应。杜绝有罪不罚现象和防止大规模残暴罪行是我们的国家优先事项。我们认为，需要采取全球行动来打击大规模残暴罪行和人类面临的安全威胁，这一信念促使我们批准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武器贸易条约》及其它相关国际法律文书。

背负人权使命、落实秘书长2013年12月发起的“人权先行”倡议，将有助于加强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及时应对冲突的能力。应当维持这一值得称赞的倡议。

我们重申我们对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和关于保护责任问题的特别顾问的支持。他们向安全理事会的通报是预警机制。我们呼吁这些

官员给予更多定期通报，当平民面临大规模残暴罪行的紧急威胁时尤需如此。我们敦促安理会考虑每年举行一次关于防止灭绝种族行为问题的公开辩论会，一如安理会定期举行关于保护平民、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以及其议程上其它主题议题等问题的辩论会。

保护平民是如今维和特派团授权任务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我们呼吁将联合国残暴罪行分析框架纳入维和行动规划之中。这会使维和人员更好地了解可能引发大规模残暴罪行的风险因素，并加强对平民的保护。

最后，世人绝不应忘记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受害者们。出于对他们亲人的尊重，尼日利亚支持将7月11日定为国际纪念日。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也感谢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通报。

西班牙对俄罗斯否决了联合王国为纪念斯雷布雷尼察而提出的决议草案（S/2015/508）深感遗憾。正如常务副秘书长在一开始所提及的那样，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主要职责之一是，防止像20年前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那样的残暴罪行。否决这样一项倡议标志着本组织推动取得进展的努力方面倒退了两步，一是保护我们的公民的责任方面，二是在遇残暴罪行时限制使用否决权方面。

安全理事会会议频繁，非常严肃地处理诸多事项。然而，今天我们面前的问题有其特殊意义。今天，我们开会是在缅怀欧洲近代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情形之一的受害者们，并向幸存者和遇害者亲属表达我们的声援及尊重。但是，我们开会显然也是为了展望未来，并再次明确重申，20年前的事件绝不会再度发生。

20年前沉重打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那场冲突以及随之发生的所有难以言状的罪行，是20世纪下半叶欧洲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悲剧之一。1995年7月在斯雷布雷尼察实施的灭绝种族行为，无疑是我们大家都必须予以谴责的一场暴行。战争的一贯结

果是，没有人是赢家，所有人都是输家，各方都受损。各方都是哭泣的受害者。斯雷布雷尼察的受害者就是我们的受害者。

在过去20年间，联合国在汲取教训的基础上，开展了令人钦佩的工作。我们在预警系统和防止暴行——比如我们今天纪念的这种暴行——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我们看到了《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大会第60/1号决议）对于保护责任问题作出的重大贡献。我们现在设立了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顾问和保护责任问题特别顾问等职位，他们向秘书长汇报，并在预防和保护方面发挥巨大作用。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和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作用也是如此。最后，我们还采取了秘书长提出的“人权先行”举措。

西班牙正在推动所有这些努力。保护责任协调人全球网络最近于6月23日和24日在马德里刚刚举行过会议。会议审议了最弱势群体面临的新挑战和威胁以及导致危害人类罪的当代因素等议题。

但是，斯雷布雷尼察事件20年以来，我们汲取的最重要经验就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本国。在《代顿和平协定》——它奠定了和平的基础，使波黑走上通向新时代的道路——签署20年后，该国正沿着和解、社会经济进步和全面融入欧洲——其理所应当的归宿——的道路前进。

几个月前，在关于波黑局势的半年一次的辩论会（见S/PV.7440）上，我们对该国与欧洲联盟的《稳定与结盟协定》生效表示了欢迎。我们欢迎各派政治领袖展现出面向未来的视野，践行这一书面承诺，表达波黑全体公民继续走改革和稳定道路的呼声和愿望。这就是要走的道路。这就是今天的波黑，这就是我们纪念曾经遭受苦难的所有受害者的原因。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常务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先生的通报。

7月1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举行了大会纪念仪式，秘书长和大会主席均出席。那是我们齐聚一堂追思历史的一个极为令人震撼和令人感动的时刻。今天，安理会应当缅怀这一屠杀事件受害者，表明对失去亲人、朋友或邻居的斯雷布雷尼察家庭的声援。我们还应当纪念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事件20周年，并缅怀波黑冲突各方的所有无辜遇难者。还必须一起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来改进我们未来的行动。发生这种屠杀事件，必然是可怕的集体失败。联合国对此也负有责任，因为它未能在斯雷布雷尼察履行其创立时的使命，那就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保护平民。

我们知道，在人的生命面临危险的情况下，预防必须是我们行动的核心内容。自斯雷布雷尼察屠杀事件以来，联合国制定了防止此类悲剧再演的自身机制。预防首先意味着提出警告。第一步是成立防止灭绝种族罪行和保护责任问题联合办公室，其现任负责人是阿达马·迪昂先生。我对此举表示欢迎。该办公室是安全理事会的预警机制，提请安理会关注任何有可能发展为灭绝种族罪的局势。

预防还意味着采取行动。第二步是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2005年采纳了保护责任这一关键概念。缩小这一概念的范围或是对其提出质疑，将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也是对无数次屠杀和灭绝种族事件受害者的侮辱。在通过《千年宣言》（大会第55/2号决议）以及承认保护责任这一概念的十年后，我们有义务继续执行该原则。

预防还意味着进行审判。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预见到会成立一个国际刑事法院。50年后，我们终于通过了成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对于法办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发生的违反国际法行为的主要实施者起到了帮助。刑院对于和解进程具有核心意义，它仍是开展纪念和赔偿工作所不可缺少的工具。

尽管取得了此类进展，但显然联合国仍对很多悲剧局面无能为力。在叙利亚，我们每天看到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在发生，安全理事会却仍然处于瘫痪状态。在此类重大局势中，安理会必须要能够作出反应，承担职责。正是着眼于此，法国才推动五个常任理事国自愿承诺在大规模罪行情况下放弃使用否决权。使用否决权并非特权，而是责任。因此，常任理事国首先应当表明它们在安理会内是负责任的。

20年前，即1995年7月11日，8000多名成人和儿童在斯雷布雷尼察遭到屠杀。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国际法院均将这些事件称为灭绝种族罪，这些事件也是波黑战争最悲惨和最具戏剧性的事件之一。直至今日，正如大家提到的那样，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严重的屠杀事件。

不幸的是，安全理事会今天未能通过一项决议草案来纪念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事件二十周年，缅怀波黑冲突各方的所有无辜遇难者。我在解释投票理由的发言中谈到，法国对俄罗斯反对案文深表遗憾。案文的基本价值是为了纪念，因为当地民众自己希望摆脱分裂。决议草案不仅是为了纪念该事件——这非常重要——而且也是为了强调，该地区国家必须为实现共同的欧洲前景而实现和解。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帮助起草了案文草案并对其给予了支持。草案重申，巴尔干民众的未来，和整个欧洲大陆的未来一样，不是要延续悲惨和痛苦的历史所遗留的问题，而是要在和解的基础上塑造共同的命运。

作为法国和欧洲公民，我欢迎该地区近年来为确保斯雷布雷尼察事件后出生的新一代拥有更美好的未来所取得的进展。我也欢迎所有巴尔干国家正朝着加入欧洲联盟的方向前进，并在和平和宽容基础上参与一项共同事业。这些坚定的价值观是欧洲一体化事业创始人的指导思想，而他们最初的目标就是和解。60年后，我们走过了非同寻常、无疑也是史无前例的历程。法国和欧洲联盟希望所有巴尔干国家都能够成为欧洲事业的全面参与者。

易卜拉欣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我们赞扬新西兰召开安理会本次历史性会议，缅怀20年前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事件的遇难者。我们感谢常务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分别所作的通报。

我曾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任职，参加过每年一度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纪念仪式。这对我来说十分痛苦，尤其是亲眼目睹斯雷布雷尼察母亲们的痛苦和悲伤，因为她们在经过收集和辨认在乱葬坑中找到的遗骸的痛苦过程之后，亲手埋葬了自己的亲人。迄今为止，仍有1000多名大屠杀死难者的遗骸尚未被找到。就像其中一位母亲所说的那样：“每年我都会想，今年我将安葬我的儿子。”

今天的会议确实是及时的，不仅是因为这适逢斯雷布雷尼察事件二十周年，而且还因为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谨代表马来西亚人民和政府，向斯雷布雷尼察死难者的家人表示我们最深切和最衷心的慰问。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若不以史为鉴，必将重蹈覆辙。”

考虑到该地区动荡历史和族裔民族主义抬头的迹象，我们认为，对安理会和国际社会来说，现在关键的是应发出强有力的信号，谴责灭绝种族行为和否认这种做法。我们坚信，正视事实和揭露真相，特别是关于斯雷布雷尼察死难者命运真相，将大大有助于促进和深化民族愈合伤口进程与和解。本着这种精神，马来西亚同其它安理会成员一道努力，以便达成将支持这种愿望的结果。我们认为，联合王国提出的决议草案原本可以为此作出认真的、实质性的贡献，因此，我们成为这项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并对其投了赞成票。

回顾一下在上周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纪念活动期间发表的讲话和看法，其中一个讲话特别突出，那就是潘基文秘书长的讲话。他认为，秘书处、安全理事会以及会员国都负有责任，因为当时尽管预警信号不断增加，但它们未能阻止斯雷布雷尼察灭绝

种族事件发生。我想要相信，在斯雷布雷尼察事件二十年之后，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在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方面。令我们感到鼓舞的是，联合国的工作有了明显改进，包括加强了维和能力、设立了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以及继续讨论保护的责任理论。

在“大屠杀”、卢旺达种族灭绝和斯雷布雷尼察事件之后，我们必须停下来扪心自问：世人还要再听多少次无法兑现的“永远不再”这个承诺？国际社会，特别是安理会对受害者及其家人负有责任兑现这一承诺，包括通过履行我们保护平民免遭最严重国际罪行侵害的集体责任，并且汲取过去错误的经验教训。

我们仍然感到关切的是，安理会缺乏政治意愿和分裂可能带来毁灭性悲剧，极有可能使无数无辜者丧生。我们认为，假如安理会团结一心，并且能够拿出必要的政治意愿，诸如斯雷布雷尼察这样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防止发生的。马来西亚认为，结束有罪不罚现象是防止未来暴行的关键所在。我们未能阻止斯雷布雷尼察事件，但我们至少必须力争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在这方面，马来西亚继续支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以确保追究战争期间在该地区犯下罪行的责任。我们敦促所有国家与法庭充分合作，使法庭能够完成其任务授权。

我们完全赞同先前发言者的看法，即需要向前看并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该地区促进和解。战争结束之后，马来西亚立即支持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重建努力。我们将继续这样做。通过我们的投资项目，我们努力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各个族群团结在一起，走上经济和社会一体化的道路。我们坚信，朝和解迈出的第一步是承认并且接受过去，以便建设共同的未来。我们有责任为斯雷布雷尼察受害者这样做，表明我们确实已经汲取过去的教训，我们现在因此已经进步，我们将竭尽全力防止此类暴行重犯。

在此背景下，我们感到失望和深感遗憾的是，安理会未能克服其分歧，由此未能团结起来并达成一致意见，发出信号表明我们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冲突的所有受害者，特别是斯雷布雷尼察受害者站在一起。我们担心，这种政治化分裂持续下去，使历史事实被歪曲，也无法为灭绝种族的受害者伸张正义。

刘结一先生（中国）：主席先生，我感谢埃利亚松常务副秘书长和侯赛因人权高专的通报。

近年来，在波黑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下，波黑局势总体保持稳定，经济发展向好，政治进程和法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波黑是巴尔干地区重要国家，维护波黑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实现多族裔和谐共存符合本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今年是《代顿和平协定》签署二十周年，国际社会应以此为契机，推动波黑各民族不断巩固国家建设取得的成果，继续全面履行《代顿和平协定》，推动各领域建设取得更大发展。

二十年前发生在前南地区的冲突是历史上黑暗一页。中方对在斯雷布雷尼察等地无辜遇难的平民表示哀悼，国际社会应深入反思历史，防止悲剧重演。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在处理波黑有关问题时，应始终着眼于维护波黑及本地区和平稳定，推动波黑各民族和地区国家间对话和解，实现和谐共存，这应该成为安理会的共识。中方注意到有关国家提出的纪念斯雷布雷尼察事件决议草案在波黑国内和地区国家引发争议，一些安理会成员对草案存有严重关切。在此情况下，强行推动表决尚存巨大分歧的决议草案与推动波黑国内和地区国家和解的精神不符，也影响了安理会成员的团结，中方对此表示遗憾，我们不得不对决议草案投了弃权票。

中方一贯尊重波黑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认为波黑有权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外交政策。国际社会应尊重并支持波黑政府和人民对国家道路的选择，在波黑问题上应采取平衡、慎重态度，充分尊重波黑人民的主导权和自主权，致力于

促进波黑各民族团结，实现和谐发展，推动波黑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波黑实现持久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巴罗斯·梅莱特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们愿感谢新西兰召开本次会议，作为纪念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行为二十周年耻辱与痛苦的活动的一部分。我们还感谢常务副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通报。

根据《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等所载的各项原则，智利谴责一切危害人类的罪行。鉴于在道义上必须使集体良知认识到此类问题并且承认联合国系统未起到作用的那些情况，我们会坚定地参加各种纪念大规模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径的活动。

每个社会都有权了解真相和留存记忆。为此，国际社会必须重申并再次确认对所有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声援，同时，对一切可被归入灭绝种族罪类别的罪行，无论其背景和情况如何，一律加以谴责。安理会不得评判任何国家，但恰恰相反，它要承认其后果仍对我们有影响的那些重大事实。我们在此还是为了确定如何具体地通过国际法为我们提供的各种机制来促进预防和杜绝此类犯罪。《代顿和平协定》为这场痛苦冲突的当事各方描绘了一个他们能够促进容忍、公正与和解的未来，以便继续为稳定与和平创造必要条件，创造安理会致力于达成的这些条件。

承认“保护责任”十年之后，我们重申，各国负有调查和起诉此类罪行的首要责任。国际社会必须与那些因为自身违法或者因为没有能力而未尽到这种义务的会员国一道努力，并为其提供支持。

智利坚定地致力于维护保护责任的预防性质，我国认可并参加了去年6月份在马德里召开的保护责任协调人全球网络第五次年会。

无论何时面临防止此类罪行的需要，至关重要，我们都要铭记秘书长的“权利先行”倡议。我们还应指望预防灭绝种族罪问题特别顾问和保护责任问题特别顾问的工作，并且利用残暴罪行分析框架。我们可利用的另一个核心工具是各种机制和/或国际法庭。它们确保追究责任，并避免有罪不罚现象，而且充当了未来犯罪的威慑工具或预防措施。在这方面，我们愿指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关键作用。

安理会必须通过采取有助于成功开展调查的行动，支持把局势转交国际刑事法院处理，而又不干涉那些纯属国际司法范畴的事项。安全理事会可以通过教育、提高各国内部能力和交流加强预警的良好做法等方式来推动预防。本着这一精神，我们愿再次呼吁那些拥有否决权的国家在遇有涉及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灭绝种族罪或者族裔清洗罪的情势时不行使否决权。要不然，安理会将无力捍卫那些对人类最根本的价值观与原则。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其常任理事国担负起这项责任。

记忆、真相和正义是防止重蹈覆辙必须具备的核心方面，以实现我们尚未实现的“永远不再”的希望，并在全面和解进程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斗争中取得进展。

吉莫里埃卡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我们欢迎并感谢常务副秘书长埃利亚松先生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侯赛因先生的全面通报。

我们深切希望，吸取过去痛苦的经验教训将使我们能改进当前的行动，并为防止其今后复发建立适当的机制。处理问题的根源、倡导包容性政治对话和创造一个有利于族裔多样性社会团结的环境对于预防冲突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为缅怀所有因前南斯拉夫解体而发生的巴尔干冲突之受害者——我们向他们致意，我们愿表示，我们大力支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根据《代顿和平协定》享有的统一、领土完整和主权。

我们肯定《和平总框架协定》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与更广泛地区的冲突后和解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我们还要纪念该协定的二十周年。我们重申，各国负有保护其本国民众免遭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的首要责任。对国际社会来说，假如一国政府不能保护其本国民众而且出现此种情况时，它要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纪念2005年在《世界首脑会议成果》中通过的保护责任概念十周年的同时，鼓励各会员国加大预防工作的力度，以便结束不惩治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的现象。凭借非常明确的保护平民任务授权来增强联合国维和特派团的权能是一项尚未完成的任务。有效维和和要求明确了解风险因素和触发大规模暴行的因素。

我们鼓励把联合国残暴罪行分析框架纳入指导联合国和平行动的各项战略。成立人权理事会、加强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设立国际刑事法庭、强化问责和国际刑法始终是在维护人权与法治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

最后，国际社会应为该区域各国提供支持，以便加强其相互间的合作并支持波什尼亚克族人、塞族人和克罗地亚族人之间的和解努力。

雅库博夫人（立陶宛）（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常务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先生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亲王的通报。

今天，我们悼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欧洲、即1995年7月在斯雷布雷尼察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最恶劣罪行的所有无辜受害者并向幸存者转达我们最深切的同情。斯雷布雷尼察发生的灭绝种族罪行留下了深深的疤痕：成千上万人被处决并被埋入乱葬坑，数百人被活埋，男女老幼遭到残害和杀戮。我们铭记所有这些暴行，以便它们永远不再发生并且人类的原则永远不再被抛之脑后。这种纪念活动对于预防和解决世界各地其它冲突也至关重要。令人深感遗憾的是，由于俄罗斯今天的否决，

安理会未能在向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罪行的平民受害者致意方面表现出团结一致。

我们谴责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冲突期间犯下的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必须把这些犯罪者绳之以法。

斯雷布雷尼察的罪行不容否认。为了实现和解，必须接受过去并确保为各方的受害者伸张正义。因此，各方的政治精英必须承认并接受过去发生的事，包括灭绝种族的事实。区域中的政治家必须拿出勇气、消除分歧，并携手实现我们大家希望看到的稳定未来。

数以百计家庭生活在痛苦之中，不知道亲人的下落，不知道真相。一位失去两个儿子的母亲在描述丧失家人的人的经历时说，“活着不是因为你想要活着，而是因为你没有选择才活着”。

需要作出更大努力。残酷和有预谋的性暴力的大约20000名受害者生活在阴影里，不敢说话，不敢讨公道。她们需要得到照顾、保护和支持。20年之后，这一罪行的巨大规模同寥寥几个被定罪的凶手形成鲜明对照。

只有真相和正义才能培育和平与稳定。国际法院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已确认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事件。制造这场悲剧的人现在正在接受审判。

国际社会和70年前成立的联合国想要使人类免遭巴尔干人民经历的那种恐怖。波斯尼亚的经历是联合国历史上一个痛苦的经历。必须吸取这个教训。

今天联合国具备了更好地检测可能发生暴行的早期预警迹象的能力。保护责任决不能仅仅是停留在纸上的概念。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顾问和保护责任问题特别顾问，以及秘书长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特别代表和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是这一战略中的关键因素。他们为提请安理会注意践踏人权行为所作的不懈努力是值得赞扬的。

但是，正如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也许从这些可怕事件中吸取的最重要教训是，必须以一切必要手段和政治意愿果断地应对有系统恐吓人民的行为。然而，缺乏政治意愿和意见分歧往往阻止采取果断行动，包括安理会的行动。让我明确指出，在涉及大规模暴行的情况下克制使用否决权不应仍然是一个理论上的选项。我们呼吁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立即宣布这样做。

让我们利用这个庄严场合鼓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他们的后代建设更美好的未来。过去20年里并非没有积极的变化。在欧洲联盟对其努力的持续有力支持下，该国正在采取步骤融入欧洲。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议会和政治领导人最近就一系列广泛的改革达成的协议，以及他们对积极参加和解进程的承诺，希望会帮助他们克服分歧、为了未来而团结起来，并确保区域的稳定与和平。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成员应当并将继续支持这些努力。

威尔逊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联合王国对俄罗斯今天否决这项决议草案感到愤怒。俄罗斯的行动玷污了对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事件所有死难者的记忆。俄罗斯将必须向8000多名死难者的家属解释它的决定，这些死难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严重的暴行中遭到谋杀。

决议草案并没有指责埋怨、在政治上得分，或是试图重新揭开痛苦分裂的伤疤。它没有把斯雷布雷尼察的罪行同塞族人民联系起来。它确认各方都有受害者，它的目的是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即安理会支持波斯尼亚的和解。

但和解的基础必须是共同接受在斯雷布雷尼察发生灭绝种族罪的事实。这是一个法律事实，不是一个政治判断。这一点是不能妥协的。因此，俄罗斯选择站在某些人的一边是极其令人遗憾的，这些人以行动阻止实现和解——这些人今天不愿意接受事实。

一些人说，我们提交这项决议草案面临着巴尔干族裔分裂的风险。过去几周区域中的情绪反应表明，只有确认和接受过去的行动，不然我们无法前进。正如Adisada Dudic在上周的纪念活动中非常感慨地说，“否认不会使事实消失。不会改变过去。而且当然不会抹去记忆”。

否认事实，而不是这项决议草案，才会导致分裂。否认事实是对受害者的最后侮辱。这样做有损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安全、和平未来的前景——该国全体公民理应享有这样的未来。因为，即使在20年之后，波斯尼亚家庭仍然在经历有些人选择否认的恐怖。数以百计灭绝种族罪的受害者——父亲、儿子、母亲以及女儿——的遗骨仍然有待发现。直至今日，他们的亲人继续受苦和寻求真相。俄罗斯的行动只会加剧他们的悲痛。

尽管遭到这一否决，我们大家必须继续支持波斯尼亚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未来，这个未来的基础是接受过去。

安理会今天有机会对它在1995年、今天和未来预防灭绝种族罪的责任进行思考。我们关于欲免后世再遭战祸的保证表明了这一责任。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年之后，在签署《联合国宪章》50年之后，我们打破了自己的承诺，允许灭绝种族罪回到欧洲，回到波斯尼亚东部一个小镇，一个联合国指定的安全庇护所。

科菲·安南说，斯雷布雷尼察的悲剧将永远在联合国的历史上阴魂不散。俄罗斯的否决票表明，很难让这些鬼魂休息。但是，我们必须继续思考我们作为个人、国家和本组织所吸取的教训。

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的20年之后，我们现在有着更多的工具来预计和预防冲突及灭绝种族罪。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预防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顾问和保护责任问题特别顾问发挥了关键作用。秘书长的“人权先行”倡议和新的残暴罪行分析框架是可喜的发展。并且我们目前在联合国以外可以获得甚至更多的即将发生冲突的信息。通过非政府组织、

人权监测员和社交媒体，我们可以看到任何向灭绝种族罪滑动的迹象。

但早期预警并非早期行动。我们知道斯雷布雷尼察的风险。我们看到了关于族裔清洗的报告、万人坑的迹象。我们听到实地记者的报导，但我们没有行动。我们不采取行动的后果直到今天还在引起反响。

今天，在南苏丹、叙利亚以及扩散中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灭绝种族和大规模暴行的风险仍然呼之欲出。我们不能重复20年前的错误。一有早期预警我们就必须采取行动。我们必须在安理会实现更大的团结，利用我们手头的所有工具这样做。俄罗斯否决这项决议草案表明了实现团结是多么困难。但我们必须坚持下去，因为这是使“永不重演”成为现实的唯一途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新西兰代表身份发言。

我们今天听取了常务副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的通报，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国际法院认定这一事件涉及灭绝种族行动。新西兰同其他国家一道悼念这一灭绝种族事件受害者。我们向受害者的朋友和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今天仍然感受得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战争的毁灭性影响，尤其是在冲突中丧失亲人的人们的记忆中。我们向这场冲突的所有受害者表示慰问，他们许多人死于今天仍然使我们的集体良知感到震撼的大规模屠杀。

值得庆幸的是，20年后实地的情况当然非常不同。

然而，二十年后，实现和解仍然是一个大问题，需要人们持续关心。我们看到，各方为实现和解采取了重要步骤。已经作出承诺，将继续沿着这条通往和平与友谊的道路前进。新西兰鼓励有关各方一道走这条道路。

时任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其1999年关于斯雷布雷尼察沦陷的报告中问道“联合国如何保证将来在维持和平行动中不在其眼皮下发生这种惨案？（A/54/549，第469段）”

逾15年后，这是一个仍在寻求全面答案的问题。这是一个在缅怀所有灭绝种族罪行和大规模暴行的受害者时理应回答的问题。我们作为安理会，有责任牢记过去，以便作出一切可能的努力来避免历史重演。

新西兰深感遗憾的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和其他人作出努力，试图确保这次纪念活动会以安理会团结一致为特色，而事实却证明并不可能。自1945年以来，在认识到《联合国宪章》相关规定的同时，新西兰一贯反对否决权。新西兰感到遗憾的是，尽管得到安理会多数成员支持，但这项决议草案仍未获得通过，因为有一个常任理事国行使了否决权。在一次纪念会上行使否决权，让我们感到特别不合适。尽管这仅是一张反对票，但结果却影响到我们所有人。它再次显示，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找到更好的工作方式，以确保安理会能够在必要时达成一致和采取行动。

联合国和安理会辜负了前南斯拉夫境内这场冲突的许多受害者，特别是斯雷布雷尼察的那些受害者。这些失职之举使各方的无辜民众付出了骇人听闻的代价，而在过去这么多年之后，人们依然能够强烈感受到这一点。今天，安理会辜负了这些无辜受害者。展望未来，要避免在斯雷布雷尼察乃至在卢旺达再度发生那种事件，我们就必须作出更多努力，而不只是力求制定更好的任务授权和努力改进安理会授权的维和特派团的能力。不过，这当然也是重要的起点。但除此之外，安理会显然应当更积极地努力防止暴力冲突的发生。

但让我们也诚实到足以相互承认并向自己承认，防止在斯雷布雷尼察目睹的骇人听闻事件再度发生的唯一保障是，作为会员国，我们履行我们作为加入本组织的条件而承担的《宪章》承诺。我们

所有人，即，联合国所有成员，不论种族、肤色、信仰或历史，也不论发展情况，都必须以此为己任。这对于我们共同具有的人性至关重要。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职能。

俄罗斯联邦代表要求再次发言。我要敦促他和任何要求发言的其他人记住我们今天正在举行的这次纪念活动的庄严精神。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要发表两点意见，一点是程序性的，而另一点是实质性的。

程序性的意见如下。今天，有几位代表发了两次言，一次是解释投票理由的发言，一次是关于实质问题的发言。我们注意到，法国代表在其第一次发言中没有说过一句解释其投票理由的话。我们认为，这种发言是不适当的。

关于实质问题，一些代表团，特别是美国代表团和联合王国代表团，批评了俄罗斯的立场。它们歪曲了我们的立场。我强调，我们的立场根本没有证明它们的意见有道理。我只想建议，它们本应当更认真地聆听我们的发言。然而，在这方面，我也有几个问题要向美国代表和联合王国代表提出。

我们最近纪念了越南战争结束四十周年。为什么我们没有举行一次安全理事会会议来纪念此事？为什么没有提出任何决议草案来谴责对河内实施的地毯式轰炸、使用凝固汽油弹的行为或由卡利中尉——美国总统赦免了此人——带领实施的美莱屠杀？我们最近还纪念了美国和联合王国非法入侵伊拉克十周年。由于那次入侵，有100多万人可能已经遇难，而且整个地区直到今天仍然处于危机之中。为什么美国和联合王国没有建议安全理事会就这一议题通过一项可能以适当的名称来指称有关事件的决议呢？

问题是，这些代表团的人道主义可以视政治情势来回开关，从而损毁我们对它们的发言和行动的信任。

主席（以英语发言）：美国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鲍尔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本着这次沉痛纪念活动的精神，我将作非常简短的发言。

第一，我要说，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都应当正视自己的历史，而正视这一历史是实现和解的前提。在查尔斯顿发生与我国社会中仍然存在的种族分裂有关的事件之后，我国正在经历类似事情。每个社会都应当回顾过去，但俄罗斯代表刚才的发言不仅表明，俄罗斯准备否认那次灭绝种族事件，而且还表明，通过否认，它只想分散人们对该核心事实的注意力。

没有人能够分散我们对一个核心事实的注意力，而这个核心事实就是，有8000名穆斯林男子和男童因为他们是波斯尼亚穆斯林而被拉多万·卡拉季奇和拉特科·姆拉迪奇领导下的波斯尼亚塞族人——而不是被塞族人民——有系统地杀害了，而且这些家庭今天感到双重悲痛，首先因为他们失去了亲人，其次还因为我们确认和纪念在斯雷布雷尼

察发生的灭绝种族事件的集体努力被俄罗斯否决了。

主席（以英语发言）：联合王国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威尔逊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的发言将非常简短，只想说现在是一次同联合国作为一个机构和安理会有着深刻联系的事件20周年纪念。因此，我们注重此事，是绝对至关重要和绝对正确的。我们自豪地执笔起草了这项决议草案。寻求以我们今天尝试采取的方式纪念该事件，绝对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

主席（以英语发言）：俄罗斯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将响应你的呼吁，顾及本次会议非常特别的性质。因此，我不对美国代表和联合王国代表刚才发表的指责性的长篇大论作出回应。

中午12时15分散会。